

他们以生活为笔,写下最真实的人间。他们在奔波中捕捉诗意,在漂泊中记录乡愁,在劳作中直面人生境遇。他们来自街头、来自工地、来自家政间,他们是认真生活的普通人,他们的文字褪去浮华,饱含生活的温度与力量。本期,让我们走近这些热爱生活、坚持书写的普通人。

——编者

特别策划

纸上烟火

诗是生活的一颗糖

□ 张晓媛

外卖员王计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。他的第一本诗集《赶时间的人》上市仅1个月就已发行3万册,其中一首诗在网络上的阅读量超过2000万人次。在送外卖之前,他还做过建筑工、捞沙工,捡过破烂,摆过地摊,开过翻斗车,看过杂货店。他一直在踏实地生活,也一直在不停地写作。

诗是古老的文学体裁,如果按《诗经》的分类方式,很显然王计兵的诗属于《风》的部分。回顾他的经历,半生风雨漂泊,终日辛劳奔波,“一个飞奔的外卖员,用双脚锤击大地,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”就是他的真实写照。外卖员是我们接触很频繁的一个群体,但我们却很少真正了解他们的生活。在王计兵的诗下,他们赶时间:“从空气里赶出风,从风里赶出刀子,从骨头里赶出火,从火里赶出水。”他们的小指是外卖的钩子:“那些滚烫或冰凉的外卖,时常挂在钩子上,让我看上去更像是一面行走的墙。”他们因为母亲的担忧放慢了车速:“和秒针抢速度的外卖骑手,在母亲面前,不得不缓慢下来。”一个个我们熟视无睹的匆忙身影,在

这一行行诗句中面目逐渐清晰了起来,每一次出发,每一通电话,每一趟等待,都有了生计之外的别样情愫。写作者的本能让王计兵不局限于个人的忙碌与委屈,除了记录自己饱满的每一天,他还把目光投射在更多同样在生活里拼搏的劳动者身上,并为他们勾勒出温柔的侧影。他写一群攀爬在脚手架上的农民工:“多像一筐春蚕爬到了草棚上,他们不断收缩的身体,在阳光的照射下接近透明。”他写清晨正在被点名的绿化工:“每喊一声,一朵花就应声开了。”他写靠在墙角睡着的清洁工:“一道道闪电,把她沟壑纵横的脸颊,照如战壕。”他在手提外卖一趟趟冲刺的同时,还在为万千同行者加油鼓劲,“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,只有一站和下一站”。当我们疲惫地蜷缩在拥挤的地铁里,当我们加完班走进空荡荡的电梯间,当我们给父母打电话说一切都好时,很难不被他的诗打动。外卖的饭菜填饱了饥饿的肠胃,然而这些精彩的句子则熨烫着那些充斥着潮湿与皱褶的瞬间。

他的诗非常好读,不故弄玄虚,也不拆解技巧,只是原原本本地将自己感受到的世界——一切片、细细描摹,却让人会忍不住一首首读下去。我们会惊讶于文字的赤忱质朴,更会惊讶被挤压的时光缝隙里,仍然可以开出这么美丽的花。这样的诗显得鲜活,是因为诗人的脚先牢牢踩进泥土里,再抬头放声歌唱,自有一股浑厚的中气。诗本来就源于劳动,在一句句铿锵有力的号子里传播,在一首首言之有物的山歌里,并不是文人雅士闭门吟哦的专属。

他在一首诗中这样描写诗和生活的关系:“如果说送外卖的生活是苦的,是日子里喝下的药,毫无疑问,我的诗,就是药后吃下的那颗糖。”正因为这些闪光的诗行,活着不再是一天天单调的重复,劳动也不再是一桩桩周而复始的累积,而是成为一种执着、坚韧,一种不屈服的创造。生活的反复锤炼造就了他的豁达乐观,而写作不仅给予了他片刻的喘息与安宁,也让我们窥见了生活的真相,那就是继续努力奔跑,在艰难前行中仍然记得去赞叹世间一切美好。

足下风雅,纸上生涯

□ 全 笈

1992年,一个来自江西永修、体育系毕业的年轻人,怀揣着简历,站在东莞市人民公园门口举目四望,用“石头、剪刀、布”的方式来决定人生的去向。

三十多年过去,这个曾经在跑道、球场摸爬滚打的体育人章新宏,还在与生活暗暗地“较劲”——在手机上一字一句地敲出了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,汇成了这本《从江右到岭南》。

一个体育人,是怎样一步步成为作作者的呢?这还要从章新宏母亲的一句话说起。1989年夏天,他拿到九江师专体育系的录取通知书,家里人满心欢喜地摆酒庆贺,母亲却轻声漏出一句:“你要不是体育系的就好了。”他后来回溯写作的起点时说道,这句话“不是刺,但是个提醒”。他暗自发誓:体育生也可以能文能武。于是,他送女儿补习时坐在车里写,在高铁上写,泊车时、等待时、旅途间隙里也执着地写。

最终,章新宏把一切归为两个字——“好玩”。这两个字看似轻描淡写,实则是把三十年前的那场较劲轻松卸了下来。李敬泽说:“写散文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。”我想,对于章新宏而言,写作不只是存在的方式,更是对母亲的回应——原来体育人也可以在文字的世界里自由驰骋。

本书有气质反差。“体育”二字里自带“魁梧、肌肉、壮实、风风火火”的画面和元素,但是细细品读他的文字,却有着令人意外的细腻。在《搓背》里,他这样写父亲:“父亲腰部和下身的老年斑都发黑了,特别是上臂长的那颗肌肉瘤,大得有些像熟透的桑葚,格外扎眼。”我读到此处,心里猛地一颤。桑葚是甜的,是美好的童年记忆。可他偏偏用它来形容父亲身上的肌肉瘤。甜蜜的意象与衰老的病痛叠在一起,读来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涩。

写母亲时,章新宏更往里收。母亲的形象在书里不是一次性铺开的,而是细碎的——五斗橱暗格里藏着的血汗钱。还有《父母老了》里那句让我鼻子一酸的开头:“母亲突然一下老了,老得令人猝不及防。若不是她去年毫无征兆走丢一回,我们谁也不知道母亲其实早已认不得回家的路了,连儿女的名字也记不清。”更戳人的是送别那句。他背包出门,母亲像祥林嫂似的念叨“你怎么又要走了呢”,可再见面时她已经记不清,只“惊奇地问:咦?你怎么来了”。我想,他写母亲,用的是另一种“体育人”方式——不是观察肌肉和关节,而是观察那些重复的动作、细碎的念叨、逐渐褪色的记忆。他不解释,

不感叹,只是把那些生活碎片一个个捡起来,摆在那里。母亲记得什么、忘了什么,说了什么、没说什么,他都记着。

本书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年龄反差:他56岁的身体里住着一个顽童吧。我常常忘记作者的年龄,是宏子?还是老章?他写童年的自己,语气里没有过来人的沧桑,倒像一个刚放学的小孩,迫不及待地要把今天的趣事讲给你听。钻过狗洞,偷过荔枝,吐一口唾沫淹死过一只蚂蚁,还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。也因为嘴馋,把理发的钱换成零食,最后揣着剩余的六分钱,自作聪明地去找师傅“修面”……那些画面太鲜活了,带着泥土和汗水的味道。我想,一个56岁的人还能把童年写得如此鲜活,他心里那个少年应该从未走远。体育磨砺了他的身体,却没有磨掉他眼里的光。

三十多年过去,他早已不是茫然的体育系毕业生,却依然是那个不服输的体育人。本书里所有的反差,归根到底都源于同一个源头:他是一个体育人,却从未被世俗观念里的“体育”二字定义。母亲那句轻轻的遗憾,他用半生去回应。从江右到岭南,他跨越的不只是千山万水,更是旁人固化的偏见,他用半生笔墨,活成了独属于自己、文武兼备的风雅人生。

尘埃里的星光

□ 宋 波

拿到诗文集《我扫过的人间》,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封面上那片灿烂而踏实的橙色,那是与环卫工装一模一样的颜色。这本书是环卫工人黄新生的首部个人作品集,这个56岁的环卫女工用扫帚与钢笔“扫”出了一部感人肺腑的人间故事。

这是一本没有“文学野心”的书。没有复杂的叙事技巧,没有精雕细琢的语言。全书分为“我扫过的路”“我路过的人间”“我的新生”三个篇章,记录了黄新生辗转各地的生存经历、环卫工作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,以及对生活的感悟与思考。正是这种“不追求技巧”的文字,让这本书拥有了珍贵的品质——真诚。

黄新生的人生本身就如同一部厚重的底稿。她早年经历不幸,后来辗转做过婚纱厂女工、保姆、建筑工人。2014年回到长沙成为一名环卫工人,这一干就是十多年。不幸没有变成诉苦的材料,而是化作了笔下的养分。她写自己的橙色工装与皴裂的手掌:“我的衣衫,在万人丛中一片橙;我的手掌,在垃圾堆里熬着。握个手,我都怕熏着你。我把扫帚磨得雪亮,插进垃圾的心脏里……朋友,我只能如此——让你每天干干净净地行走。”没有任何修饰,却让读到的人瞬间理

解了那份职业的尊严与隐忍。书中还有这样一句诗:“拿扫帚的手,也能画星月。拖垃圾的斗,推着晨光走。”扫帚与笔在她手中完成了奇异的统一,前者清扫街巷,后者清扫人心。

这本书里打动人心的,是那种“写我所做,做我所写”的真实。黄新生用拿扫帚的手写字,她的文字里只有最鲜活的生活体验和最真诚的情感流露。书中有几个细节让我久久难忘:水车司机方师傅身患肿瘤,却在清扫马路时温柔地拾起路边离世的小猫;一个被病痛缠绕的人,依然对世间最微小的生命怀有悲悯,这份柔软,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。黄新生写自己牵着两个孩子“如牵着两只蜗牛,一步不敢停”,一个单亲母亲走在生活的陡坡上,不敢松手,不敢倒下,那份小心翼翼的坚韧,读来令人心头发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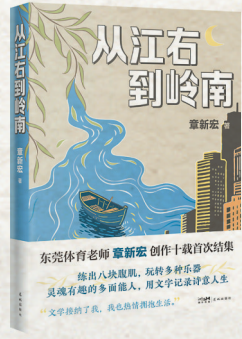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的价值,在于它让一个群体真正“被看见”。黄新生记录身边的人与事,“以篇篇散文、句句诗行为凡人立传,不拔高也不渲染,只是温和地呈现另一种价值尺度:一个人弯腰扫地的姿态,与一个人站在会场中心的姿态同样高贵”。这本书还让我们重新理解了“劳动”二字。黄新生在扫街的间隙里写下:“劳动改造世界,劳动驱散阴霾,劳

动让人心生希望。”更令人动容的是黄新生面对命运的态度。丧夫之痛、养家之苦、学习之难,“如生命中或大或小的雨,浸润也好倾盆也罢,都成为潮湿的养分”。她经历苦难却不被苦难所定义,记录伤痛却不讴歌伤痛,面对命运的不公,从不将文字化为发泄怒愤的利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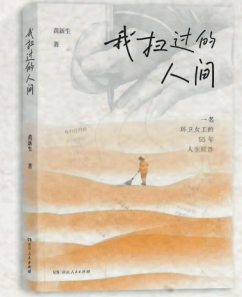
扫帚划过街道,扫去的是垃圾,留下的是洁净;文字流过人间,记录的是尘埃,升起的是星光。《我扫过的人间》如一面镜子,照见了那些我们匆匆路过却从未真正注视过的人。它提醒我们: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,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发光。它让我们看到:文艺的根脉,从来都深深扎根在人民之中,扎根在平凡的生活里。文学或许从来就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技巧,它需要的,只是一双真正看见过人间百态与美好的眼睛,以及一颗从未蒙尘的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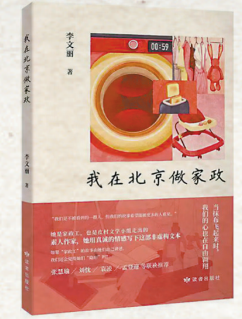
▲《赶时间的人》
王计兵 著
台海出版社



▲《从江右到岭南》
章新宏 著
花城出版社



▲《我扫过的人间》
黄新生 著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▲《我在北京做家政》
李文丽 著
读者出版社



▲《嬢嬢勇猛》
施洪丽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从“隐身人”到发声者

□ 袁 枚

李文丽的《我在北京做家政》,是一部家政女工的生命实录,更是一部凝聚着劳动尊严的纪实之作。全书共分三个篇章:第一章“我在北京做家政”以亲身经验书写家政劳动的日常肌理;第二章“我和姐妹们”将镜头转向身边打工姐妹的群像境遇;第三章“来处与归途”则回望在甘肃老家的童年、婚姻与乡土记忆。三章架构从身体经验到情感联结再到精神归途,构成了一条用心铺就的精神变化轨迹。

阅读李文丽的文字,我们能触摸到一种可贵的审美质感。她记下的是每一次拖地的触感、每一个哄睡孩子的夜晚、每一餐合乎雇主口味的调配。但又在劳动的身体性之外,保留了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——客厅里的绿萝、开着粉色花朵的蟹爪兰,让单调的劳作瞬间散发出诗性的光芒。这种从身体劳作到诗意感悟的转化,使她不再是单向度的劳动力付出者,而成为有着主体感受与审美判断的劳动者,将日复一日的劳动转化成充满诗意的自我言说。

李文丽笔下的家政群体来自天南海北,却有着共同的沉默与坚守。休息时间,拥挤的宿舍里,方言交织成一首无形的大合唱:有人捧着手机讲起家乡火把节的热闹,有人红着眼眶倾诉雇主的刻薄,视频里牙牙学语的孙子立刻让几双疲倦的眼睛同时弯起月牙。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场景,在李文丽的笔下有了标本般的意义,她从“我”的切身感知出发,为“她们”共情,并为“我们”集体发声。她以灵敏的感受力让读者看到这个隐形群体的“斑驳”和“真实”。

更耐人思考的是,李文丽的写作正在触及一种新型劳动者书写的时代命题。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重塑社会分工、“85后”“90后”家政劳动力短缺的当下,家政女工的生存状态尤其值得聚焦。李文丽的写作让我们意识到,家政劳动并非传统意义上无色无声的隐形劳作,而是充满声音、颜色、温度与活力的现实存在。家政女工不只是被动的服务者,而是在劳动中时刻建构职业尊严、社会价值和文化表达的能动个体。

还有一个让人动容的细节是,李文丽回望故土的笔墨从来不是诅咒和决绝,而是和解与容纳。她抱愧于自己无法陪伴孩子们成长,惦念着遥远的母亲和逝去的父亲,用最质朴的文字为生命中最亲近的人郑重存档。她曾在诗中写道:“我把满腔的爱和责任都给了城里的宝宝,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陪伴你们。”短短两行诗,写尽了万千家政女工藏家人亏欠于心间的隐痛。与一般漂泊文学中的疏离感不同,李文丽的“归途”始终浸染着乡土的温度和亲情的光泽。

书名本身即是一种自我命名:不是《家政女工记》,不是《保姆日记》,而是《我在北京做家政》。“做”字用得极有分量——它不是被动地承受劳动,而是主动地创造生活;“家政”二字也不是低人一等的代名词,而是一种值得被书写与记录的社会坐标。当我们随着李文丽的笔触走进北京大街小巷某个住户的厨房与客厅,推开某间阳台和杂物间的隔帘,我们不仅看到了一名农村女性以文学姿态昂首走出的人生突围,更看到了一个时代里,万千默默支撑城市运转的家政劳动者的精神剪影。从甘肃的山沟沟出发,到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永久收藏,李文丽以她的文字与现实向我们证明:再平凡的尘土之中,也能开出坚韧而不屈的花朵。

煮一锅“英雄味”的火锅

□ 裴金超

一个48岁的女人,查出乳腺癌,丈夫久病缠身,女儿婚恋磕磕绊绊,全家就靠她撑着。读《嬢嬢勇猛》之前,我以为这是一本苦大仇深的书。可翻开书我才发现,作者施洪丽压根没打算按悲剧的剧本演。

2020年,施洪丽被查出乳腺癌。医生预判她生命只剩下几个月,施洪丽在一种“时不我待”的紧迫感中,写下了这本书。书不厚,12个章节,读起来沉甸甸的。开篇就叫《再见,皮村》——皮村是北京东五环外一个著名的打工者聚集地。施洪丽租住在那儿一间月租七百元的铁皮小屋里。她在书里自嘲:“我的日子过得恼火,连蜗牛都不如,蜗牛还拥有一套带永久产权证的房产。”施洪丽做过农民、后厨小工、地摊摊主、擦鞋匠,后来成了家政公司的金牌月嫂。公司黄了,她到北京从头再来。丈夫体弱多病,她就“携夫讨生活”,几十年风雨,始终患难与共。

一个打工的女人想读书写作,在世俗眼里是“不务正业”。有人当面泼冷水:“出来打工就安心干活挣钱,天天看书写字有什么用?能当饭吃吗?”那些闲言碎语像石头一样压在她心上,她喘不过气来,甚至赌气卖掉旧书、放下纸笔,逼自己做个“正经”的打工仔。可勉强迎合世俗、委屈本心的日子,终究过得煎熬。后来她想通了——人活一世,若连自己心里那点火苗都护不住,活着还有什么劲?于是她不再在意旁人眼光,重新拿起笔。

2017年,她加入了北京皮村文学小组。那是一个由打工者组成的写作圈子,大家白天在工地、车间、厨房里卖力气,晚上聚在漏风的屋子里谈文学、改稿子。从那时起,打工糊口、阅读养心、写作立命,成了她人生的三根柱子。2020年,乳腺癌找上门来,施洪丽将抗癌、打工、写作三件事拧成一股绳,硬是扛了六年,生生把“死刑”改判成了“临床治愈”。患病期间,写作就是她的化疗药,每写一页,癌细胞就退一步。

施洪丽写字,用的是四川人“摆龙门阵”的方式。她不端着,不煽情,就那么往你面前一坐,瓜子一嗑,故事就来了。她不光写自己,见过的听过的各种人,被她一一记下来,像一幅流动的当代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有评论说这本书更像一盆麻辣鲜香的火锅,我觉得贴切极了。火锅的特点是什么?什么都能往里涮——毛肚、鸭肠、土豆、藕片、豆腐皮,荤的素的,一锅同煮。施洪丽笔下的世界就是这样:她写的是那些在生活在夹缝里的芸芸众生。

住院期间,她写同病相怜的病友,鲜活生动。有个老爷子查出大病,女儿怕花钱不想治,老爷子却盘算着把拆迁补偿拿到手留给儿孙;有个盲人病友,五保户资格眼看要取消,可大病一来,反倒成了“护身符”。人间百态,悲喜交织。她说自己“在病房上蹿下跳,忙得不亦乐乎……谈笑间,癌细胞灰飞烟灭”。这气魄,有侠女风范。做完手术,她说“我对生活更依恋了”。化疗结束,她写“我看起来与常人无异,胖乎乎的,精力充沛,喋喋不休”。别人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,她却在生活的伤口上种花,在命运的围追堵截中杀出一条血路。

施洪丽让我想起了很多这样普通的中国女性。她们有一种本能的生命力:天塌了,顶着;地陷了,垫着。她们不会说什么漂亮话,但她们用一辈子诠释了什么叫“勇猛”。读《嬢嬢勇猛》如同吃洋葱,入口喷香,但切的过程中会泪流满面。生活这锅火锅,施洪丽把它煮得滚烫,将它煮出了英雄的味道。